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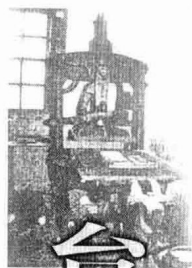
河北教育出版社

台湾

出版史

○辛广伟 著





台湾 出版史

○辛广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湾出版史/辛广伟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8

ISBN 7-5434-3996-4

I. 台… II. 辛… III. 出版工作-文化史-台湾
IV. 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8825 号

台湾出版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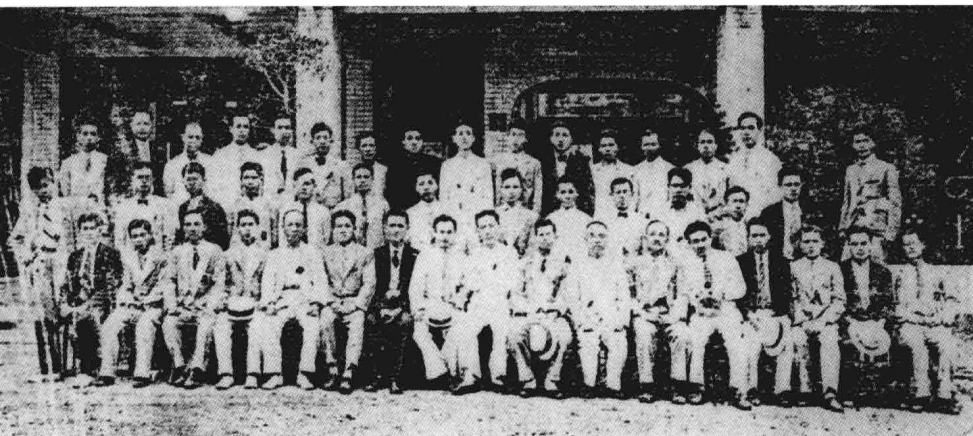
辛广伟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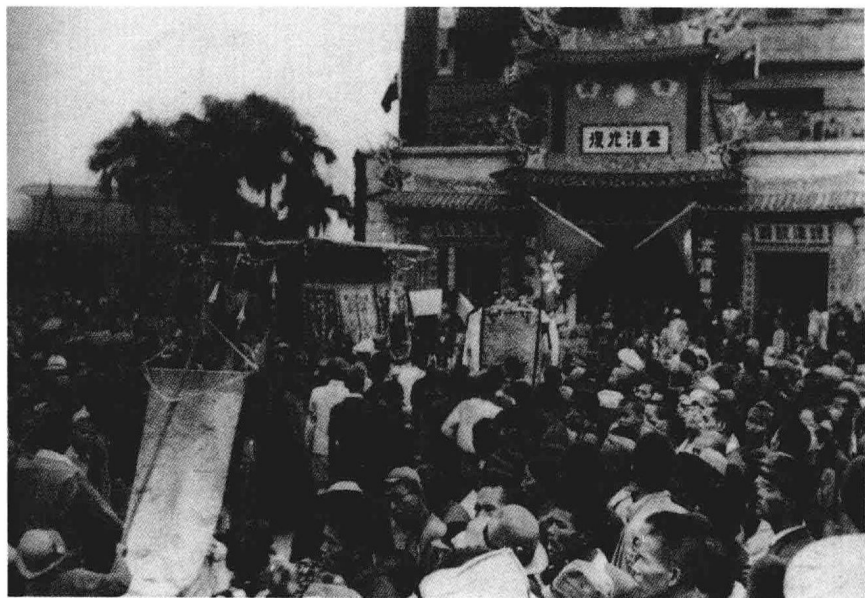
787×1092 毫米 1/16 30 印张 395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 - 2000 定价: 39.00 元

ISBN 7-5434-3996-4/G · 2968



◎ 1934年第一届台湾文艺联盟大会成员合影（台中）。

照片来源：许俊雅《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研究》，文史哲出版社出版



◎ 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时，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工会堂（今中山堂）举行。图为当时会场外之情景。

摄影：邓秀璧

照片来源：《台湾战后50年》，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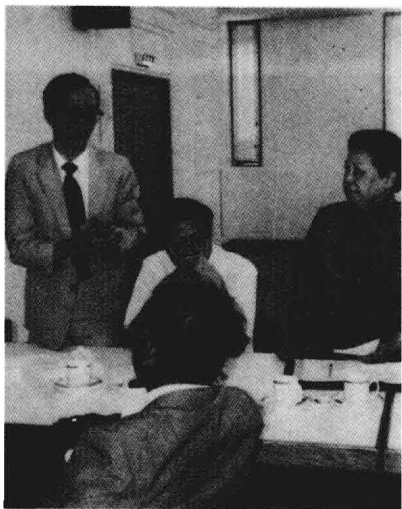
◎ 50年代初联合报的送报车队。

照片来源：联合报



◎ 从50年代起，台北市重庆南路成为出版社、书店最密集的道路，街道两旁林立的书局成就了“书店街”之美名。

照片来源：台湾出版年鉴



◎ 台湾著作权人协会在讨论翻译著作权问题。右起律师尤英夫，法学家杨崇森，作家林海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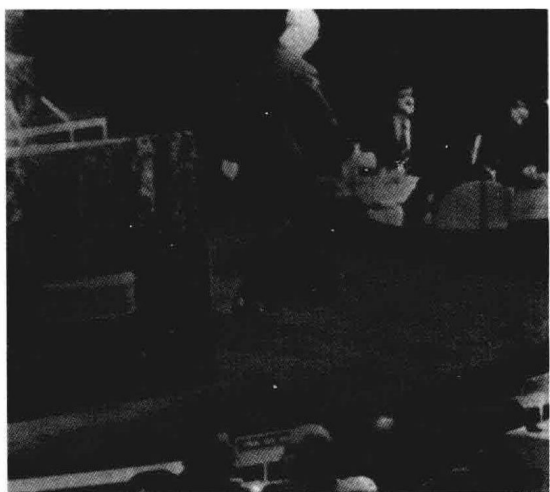
照片来源：台湾著作权人协会第五届大会特刊



◎ 据说“总统”蒋介石在一次出巡中，发现租书店屋檐下坐着许多少年，手捧书本，痴迷在读。“总统”大为感动，遂走下车去夸奖他们。可当他拿过书本时，发现少年们读的竟是宣扬“怪离乱神”的漫画书……台湾的漫画出版审查由此开始。

摄影：邓桑溪

照片来源：《台湾战后50年》，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就中国席位代表权进行表决前，“中华民国”首席代表“外交部长”周书楷在宣布台湾退出联合国后，黯然离开发言台。

随后，大会以76：35（17票弃权）票的结果通过阿尔巴尼亚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席位之议案。

照片来源：《台湾发展图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 1996年10月，台湾第一家合组的出版集团——城邦出版集团正式宣告成立。左二为董事长詹宏志。

摄影：陈建仲

照片来源：中国时报



◎ “1993 年台湾图书展览”是台湾出版界在大陆举办的规范最大的书展。

左三起陈为江、武奎煜、宋木文、黄肇、唐树备、刘杲、许力久。

照片来源：出版人杂志

说 明

关于本书，有几点必要的说明如下：

一、本书涉及的出版业范围以图书、杂志、报纸与有声出版四类为主，兼顾发行、出版研究等相关内容。为兼顾两岸对出版业的分类习惯及与出版的密切关系，本书也用两节的篇幅论及了通讯与印刷业。

二、为便于叙述，本书杂志与报纸的区分大体采用了台湾的习惯分法，即刊期在7天及7天以内者为报纸；7天以上者为杂志。

三、在出版物内容分类方面，主要以大陆出版界的分类习惯为主，除特别注明者外，出版物一般分为社会科学、科学技术（自然科学）、文艺、少儿与漫画五大类。

四、由于台湾的出版事业总体上是从光复后开始发展的，所以，一般均以光复为开端。光复至今又以解严为界，分为解严前与解严后两段。光复至解严间，一般按年代分段。光复前的各种出版活动专列为一章。

五、与出版相关的发行、书展、出版研究等均分别列专章撰写。

本书只是笔者对台湾出版的个人观察结果。由于能力所限，加之资料匮乏、时间有限等，错误与疏漏一定很多。在此恳请两岸的出版人、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绪 论

台湾出版史是中国出版史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说其重要，最主要的是因其特殊的历史与地位所致。1894年甲午战争后，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50年；光复后不久，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台湾又开始实施与祖国大陆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这两个因素，使得台湾出版业在过去的100多年中呈现出了诸多与大陆出版业完全不同的特色。同时，台湾又是现今中国出版业少数几个最发达地区之一。截止到1998年底，台湾有图书出版社6380余家、杂志社5880余家、有声出版社1930余家、报社360家、通讯社238家（台湾《1999年出版年鉴》）。据《1998台湾出版市场调查报告》推算，1997年台湾出版图书约27000种左右，图书市场销售额约在760亿新台币（约合23亿美元），新书市场销售额约295亿元（约合8.95亿美元）。

从有出版活动的记载到今天，台湾出版史约在200年左右。这200年左右的出版史又因甲午战争、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戒严与解严等重大历史事件而大致分为甲午前、日据时期、光复及整个戒严时期、解严至今几个阶段。

从清道光初年出现第一家印刷机构到甲午中国战败的70多年，可视为台湾出版的萌生时期。这一时期的台湾出版业有两个特征，一

是雕版印刷成为最初实施出版活动的主要手段,二是新式印刷机的使用。而这两点又与大陆出版业发展情况大致趋同,只是时间上迟了一些。甲午战败,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使台湾刚刚萌生、本应继续发展的中文出版立即受到致命的打击;1937年“七七事变”后,台湾的中文出版更进入了消亡阶段。1945年8月日本战败,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台湾出版又开始重新与祖国大陆的出版业同呼吸,又开始重新汇入中文出版的大河。在光复初的四五年里,台湾出版业迅速完成了由日文向中文的转变,台湾出版开始了自己不间断的历程。

1949年起,由于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使台湾出版业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开始中断,台湾出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而1949年5月20日开始的长达38年的戒严,又使台湾出版进入了一个独特的阶段。直到1987年7月解严后,台湾出版又开始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并由此迈入新世纪。

在近200年左右的台湾出版史中,光复后的50多年无疑是最重要的时期。光复后,台湾的中文出版开始逐渐起步;而国民党“政府”的迁台,又立即加速了出版业的发展步伐。台湾现代出版业各个门类的出版活动几乎都由此或在此后相继萌生与发展起来。这一时期,是台湾出版业发展最快、内涵最丰富的时期,并为台湾出版业今日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这50多年的出版历史又可以解严为线分为两个阶段,即戒严时期与解严后。虽然光复后,台湾的中文出版进入了不间断的历程,但由于戒严导致的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社会背景等因素,使得出版业在这两个阶段呈现出了诸多不同的特点。

光复后的50多年里,台湾出版主要是在戒严状态中生存与发展的。这一时期不仅是台湾出版史上的一个独特阶段,也是光复后台湾出版的主体阶段。

戒严时期的台湾出版业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当局对出版的管制异常严厉,出版业发展障碍重重,业者

如履薄冰。由于出版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较其他行业更为密切，为压制民主，维护自己的统治，国民党对出版行业制订了诸多限制措施，以此来控制这一行业的发展。对于有违他们意志的言论、行为，便利用制订的限制措施进行压制。台湾出版业者动辄得咎，如履薄冰。出版业发展缓慢、举步维艰。

国民党对出版业的限制措施是各行业中最多的。仅涉及到管制出版的法律就包括戒严法、出版法、妨害军机治罪条例、惩治叛乱条例、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违警罚法等。法律以外，“内政部”、台湾省等各级行政机关还制定了大量的管制规定，如《台湾省戒严时期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台湾省政府、保安司令部检查取缔违禁书报杂志影剧歌曲实施办法》、《台湾省各县市违禁书刊检查小组组织及检查工作补充规定》、《台湾省书报杂志摊贩管理办法》、《新闻纸杂志及书籍用纸节约办法》、《匪首匪干及附匪分子著作查禁标准》等。这之外还有各级主管部门制订的数不清的“代电”、“解释”等。这些法律、规定、解释等向出版业者说出了无数个“不”，犹如一张张网将出版业紧紧罩住。戒严时期的台湾出版业就是在这种枷锁中生存的。

由于这些限制，戒严时期的台湾出版业出现了诸多严重违背出版发展规律的怪现象。报刊社、通讯社不能设立两个以上发行所，杂志不能发行副刊与增刊、个人不得办军事杂志，出版本国作者的漫画受到种种刁难、出版日本漫画却异常顺利，大量抒情歌曲不得出版发行，主管单位动辄停止出版申请登记，等等。而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台湾报纸家数始终不曾增减的“奇迹”，更是国民党压制、阻碍出版业发展的绝佳注释。

不仅绝不考虑出版行业的发展，对于不和当局者意图或有“出轨”行为的业者，当局更是严厉处罚，毫不留情。出版业者被警告、罚没、暂时停刊、吊销登记证等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更有甚者还要为之坐牢。《自立晚报》、《民族报》、《公论报》等报纸都曾因发表触怒

当局的文章而遭遇过被勒令停刊的处分,《自立晚报》曾被停刊近一年之久,《公论报》在国民党的内外夹击下,无法生存,只得卖掉经营许可证。在1954年的所谓“文化清洁运动”中,“内政部”一次就停刊了《中国新闻》、《纽司》、《新闻观察》等10家杂志。而对于经营宣扬民主、反对专制等内容出版品的业者,当局更要坚决镇压,严厉打击。雷震被开除党籍又下狱、胡适遭围攻、李敖被判刑……少数有自由思想、又有勇气斗争的出版业者在戒严时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与打击。

二、出版业始终是台湾民众反对专制、争取自由、与国民党斗争的主要阵地;同时,业者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始终在抗争。虽然国民党实施高压政策,但台湾民众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活动从未停止过。而出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在台湾人民争取民主与自由的过程中,出版一直在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50年代的《自由中国》、《民主潮》与《公论报》、60年代的《文星》、70年代的《美丽岛》、《大学新闻》、《台湾政论》、80年代的《自立晚报》、《八十年代》……这些在台湾出版史上赫赫有名的出版物是不同时期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专制的主要阵地。在50、60年代台湾最黑暗的时期,是胡适、雷震、殷海光领导的《自由中国》,萧孟能创办、李敖主导的《文星》使台湾民众于无声处听惊雷,给台湾人民带来自由的希望;在70、80年代国民党用各种手段封锁新闻、欺骗民众时,是《自立晚报》等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将真相告诉人民……在光复后50多年的台湾民主进程中,出版界功不可没。在近40年的戒严时期里,出版对民主运动的作用更是其他行业无法替代的。

在通过出版争取民主的同时,台湾出版业也在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与当局展开抗争。从抵制《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九条、轰轰烈烈的反对修改出版法浪潮,到争取杂志免征广告营业税、报纸主动“增张”,到力争放宽对教科书编印发的限制、对发行人资格的限制,到对漫画审查制度的抨击等,出版业者的各种抗争行

动从未停止过。正是这一系列抗争,才使得出版业始终有一线生机,才使得台湾出版业的环境逐步得以改善,台湾的出版业也才因此而逐步发展起来。

三、党公营与民营出版业者的实力逐渐转换,70年代中后期起台湾出版业开始快速发展。光复后至50、60年代这一时期,台湾出版业可说是党公营出版的一统天下(这里是指出版单位的实力,而非指数量。由于台湾对出版实施登记制,民众可自由从事出版活动,所以,无论图书、报纸、杂志、有声出版或通讯社,数量上总是民营为多。即便在“报禁”时期,也是民营报纸、通讯社多于党公营)。在戒严初的一二十年里,出版行业的各种形态多以党公营为大。图书出版发行以正中书局、台湾书店、中国新闻出版公司、中央文物供应社及文艺创作出版社等实力最强,报纸则是《中央日报》、《台湾新生报》与《中华日报》三分天下,通讯社更是中央社巨无霸。国民党一方面将手中掌握的财权用于出版,以向人民灌输其主张,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又通过出版经营来敛财,来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

不过,这一局面只维持了十余年左右,形势即开始发生变化。70年代起,出版领域党公营与民营的实力对比开始全面转换。先是一些民营的报纸、杂志在发行量、影响力上开始超过党公营报刊,接着,图书、有声出版等领域也开始发生类似的变化。60年代起,《联合报》、《中国时报》先后超过《中央日报》等党公营报纸,民营的《皇冠》、《文星》等成为最畅销的杂志。进入70年代中后期,一些朝气蓬勃的民营图书出版社开始引人注目,到80年代,随着联经、时报文化、全华、松岗、远流、光复、新学友、汉声等出版社的崛起,民营出版公司开始成为图书出版的主力军。

70年代中期起,台湾快速发展的经济、逐渐放松的政治管制,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台湾出版业开始逐步摆脱长期徘徊的局面,走向较快发展时期。一大批出版新进的产生,也为出版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进入80年代,一些出版业者开始引进企业化管理

方式，台湾的出版经营开始逐步向现代化迈进。

戒严时期的台湾出版业还有一些特点，但上述诸点是较显著的。

1987年7月15日台湾宣布解严，实施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法被废除，台湾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台湾出版业也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解严虽然仅仅十余年，但台湾出版业却已呈现了诸多与戒严时期完全不同的特色。

解严后的台湾出版业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出版业走入空前自由的空间，进入了完全多元化、商业化时代。随着解严令的颁布，过去套在出版业者身上的种种枷锁全部解除，台湾出版业进入了从未有过的自由空间。出版品内容无所不包，出版进入多元化状态；从业人数迅速增长，局面为之一新。而出版法的废止，更使出版行为彻底商业化、市场化。

解严使出版品的内容彻底多元化。过去对出版品的内容有无数量限制，解严后这些限制都不复存在，出版物也同人们的言论尺度一样，“一夜之间百无禁忌”了。解严使台湾出版进入空前的活跃状态，政治笑话、两性关系、成人与同志、竞选、本土题材、女权主义、智商与情商、科普、环保、休闲、娱乐、电脑与网络、教科书的编印等等都成为新的出版热点。出版已没有禁区，出版者所面对的只有彼此的竞争。

出版业者数量剧增是解严后另一最明显的变化。由于对申请创办图书、杂志、报纸、有声出版的各种条件限制几乎完全取消，于是，各种各样的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报纸家数由解严前的31家一跃增至1988年的90余家、1989年的近200家，及至90年代的300家左右。图书、杂志、有声出版社的数量分别由解严前的约2900、3000及600家增至解严后1988年的约3100、3800及700家，至90年代末（1996、1997年）分别为5820、5670及1780余家。而随着1999年1月出版法的废止，解严后仅存的一点对出版经营者的资格限制也不复存在，出版经营在法律上已完全等同于其他商业经营活动，台湾出版

业进入了在法律上彻底商业化阶段。

二、竞争的白热化与出版经营的企业化、国际化。在进入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的同时,台湾出版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竞争空间。解严后,台湾出版业者的数量剧增,使台湾成为出版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而外国出版公司的进入,使竞争本已异常激烈的台湾出版更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在解严前即已出现的股份化、企业化与集团化趋势,到解严后发展更快,一些具有一定实力与眼光的出版社经过多年的探索,终于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光复、皇冠、锦绣、城邦、牛顿、哈佛、依依等多家出版公司成为此一时期出版股份化、企业化与集团化经营的代表。除开放员工持股外,时报文化等少数出版公司还将公司的股票上市。

解严后,外国出版公司开始大举进驻台湾。从华克文化、桦舍文化到宝丽金、麦格劳·希尔,台湾出版业到处都有外国大出版公司的身影。有声出版界更是国际六大公司全部进入。外国公司的进入既对台湾出版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也为台湾出版业者提升自己的竞争实力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台湾出版业者也开始向岛外出击。早在80年代前后,台湾的联合报就已经将触角伸到了美欧。解严后,书刊出版业者也开始向外扩展。香港、东南亚是其主要的目标,少数出版公司的海外经营目前已取得初步进展。

三、两岸出版交流活跃,引进版权占半壁江山,严肃出版品进入低谷。随着两岸交流的开始,出版业迅速成为交流中最活跃的一环。与大陆的版权贸易、合作出版成为此时诸多台湾出版业者的一项重要业务内容。众多大陆作品通过台湾出版社进入普通台湾民众手中,台湾的许多作品也通过这种交流进入大陆。1993年11月、1994年3月两岸的出版社团还分别在北京与台北举办了两次大规模的书展——台湾书展与大陆书展。

大量引进外国作品版权成为此时台湾出版的另一项重要内容。